

许苏民 著

文化哲学

WENHUA ZHIXUE

文化哲学

许苏民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鉴平
封面装帧 赵小卫

文化哲学

许苏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第七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31,000

1990 年 6 月第 1 版 199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700

ISBN7-208-00746-2/B·114

定价 5.10 元

目 录

导 言 文化哲学——走向 21 世纪的世界哲学主潮……[1]

- 一、文化哲学的源与流……[1]
- 二、西方文化哲学的理论建树和局限性……[13]
- 三、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构想……[22]

第一章 文化发生论……[33]

- 一、走出困惑：一个新的文化定义……[33]
- 二、以往文化发生说的批判考察……[47]
- 三、文化发生：人的类本质的形成和体现……[62]
- 四、文化发生的精神现象学机制……[72]
- 五、地理环境与文化发生……[85]

第二章 文化结构论……[96]

- 一、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96]
- 二、文化心理的表层结构、中层结构、深层结构……[109]
- 三、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124]
- 四、主流文化与亚文化……[138]
- 五、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157]
- 六、文化离析与文化整合……[170]

——兼论文化整体的可分性与不可分性

第三章 文化发展论	[182]
一、文化变异与文化遗产	[182]
——兼论“断裂”与“寻根”	
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发展	[193]
三、文化心理的凝结沉淀与氤氲化生	[206]
——兼论文化心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直接来源何以可能	
四、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	[224]
五、历史的尺度与道德的尺度	[247]
第四章 文化动力论	[262]
一、文化创造：人化的内在自然的永恒冲动	[262]
二、冲破隔离：文化发展的绝对要求	[276]
三、文化交流：方式、机制、作用及其他	[288]
四、文化反省与文化自觉	[299]
后 记	[316]

导 言 文化哲学——走向21世纪 的世界哲学主潮

哲学作为一个高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反映着时代思潮变迁的最内在的本质。本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斯德哥尔摩国际社会学年会把文明选择的价值尺度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世界性课题，以及涉及政治、历史、社会等多学科的“韦伯热”在欧洲兴起，1984年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会议闭幕词明确宣布，当代世界哲学的重点已经从科学哲学转向文化哲学。这是哲学发展的一次巨大的历史性转折。曾几何时，从16世纪开始已经绵延了300多年的“经验—理性”的科学主义主潮还在第16届世界哲学会议上发出最后的耀眼的闪光，那次会议的兴奋点还是科学哲学的问题，当时人们还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新兴科学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上。

认真考察文化哲学的源流，正确认识西方文化哲学的主要理论建树及其有待克服的局限性，探讨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一、文化哲学的源与流

文化哲学的主潮并非突然自天而降。从它的源来说，可包括相互联系三个方面，它的终极根源是近代世界市场开辟以

来各民族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运动；它的直接来源，一是各民族在这一历史运动中所展现出的社会心理或文化心态；二是政治、道德、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和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所提供的可资进一步提炼升华的思想资料 and 理论启迪，从它的流来说，从思潮的萌生到形成世界性的潮流，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酝酿和发展的时期。

(一)

1. 文化哲学产生的终极根源——向现代化迈进的世界历史运动。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向着“Modernization”（现代化，或译近代化）迈进的历史运动是从15世纪的西欧开始的。几个世纪以来，它以不可抗拒的伟力，迅速地由西欧扩展到全球，形成世界性的历史运动。现实生活中的“善”与“恶”的二律背反，总是如影随形地与这一历史运动相伴而行，并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尖锐而激烈的形式展现出来。

资本的原始积累，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化的大踏步前进，创造出仿佛用魔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创造出一片震天烁地的文明景象，促进了人类精神的解放和能力的发展。但是，在这一进程中，它又总是然而又是不可避免地要到处去撕破那温情脉脉的中世纪纱幕，打破那田园生活的温馨与宁静，到处用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取代那中世纪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从而把人们抛掷到赤裸裸的现金交易和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在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那是一片“羊吃人”的社会景象，社会秩序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与工业革命相伴而来的是“劳动异化”的产生，“以致劳动者被剥夺了最必要的

——不仅是生活所必要的，而且是劳动所必要的一一对象。而且连劳动本身也成为这样的一种对象，劳动者只有用最紧张的努力和伴随极不规则的间歇才能把它据为己有。对对象的占有表现为异化到这种程度，以致劳动者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便越少，并且越加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①这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历史运动的“善”与“恶”的二律背反依然表现得相当突出。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核垄断又造成了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一方面，遵循着理性主义的原则而创造出高度严格的科层制管理形式和具有严密的制衡机制的现代国家制度，为现代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所必需；但另一方面，它又确实是“竭力把个人简化为无所不包的操纵系统中的运算因子”^②。

从落后民族向现代化迈进的历程来看，几乎从西方资本主义刚刚产生起，殖民者们就携带着商品经济的重炮，向着处于封闭和沉睡状态的各落后民族猛袭过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破了地域、民族和国界的限制，开辟了世界市场，使过去那种各民族闭关自守、文化隔离的状况再也成为不可能的了；它无情地瓦解和摧毁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促进了落后民族先进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并在落后民族中造就了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客观上推动着落后民族走上了向现代化迈进的道路，使得一些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得以利用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积极成果，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途径，实现了民族独立，并进一步向着现代化迈进；由于世界各民族的经济日益连为一体，互相依赖和促进，使得统一的世界文化的形成成为时代发展的大趋势。然

而，资本主义殖民的历史，又确实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是一部充满了贪婪、欺诈、暴行和其他卑鄙行为的历史。它以极其残酷而野蛮的方式贩运黑奴、屠杀土著居民，把一切落后民族的居住地都变成它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给落后民族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在用野蛮的手段来消灭落后民族的野蛮的同时，也无情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消灭落后民族中具有独特风采的民族文化；它用毫无掩饰的露骨的剥削方式来取代落后民族以中世纪的温情和道德的纱幕掩盖着的奴役方式，用烦扰不安的生活取代了田园生活的安定……

发生于现代化历史运动中的以上种种“善”与“恶”的二律背反，必然要在人们的社会心理中反映出来，由此而形成人类心灵中深刻的矛盾冲突——历史的与价值的矛盾冲突。

2. 文化哲学的直接来源之一——世界各民族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运动中的社会心理或文化心态。

这种社会心理可以追溯到反映在18—19世纪的文学和理论中的浪漫主义思潮，它或者表现为对于封建制度的否定而导致对文明的否定，主张“回到自然去”。提出这一口号的卢梭在其作品中高扬“个性解放”、“自我意识”、“感情发扬”的旗帜，蔑视传统观念、道德规范、价值标准，并且总是热情讴歌平民的自然淳朴的人性、美好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生活趣味，讴歌田野的秀丽风光、清新的空气，和那充满着亲切宁静的柔情的乡村平民家庭，仿佛那纯真的人性只有在大自然中才得以复归。它或者表现为对新兴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而转向大自然和带着淳朴的野性的古老的民间生活。例如19世纪的浪漫主义作家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强烈不满，经常把大自然的“美”和社会现实的“丑”相对比，赞美没有沾染城市文明的平民的淳朴，把大自然和平民生活作为精神上的寄托。浪漫主义文学作

品中所反映的社会心理,一方面表现了要求个性解放、弘扬自我的时代强音;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于“文明”压抑情感的强烈抗议这一非理性主义的情绪。罗素指出:“德国的唯心论全部和浪漫主义运动有亲缘关系。这种关系在费希特很明显,在谢林(Schelling)更加明显”③。

随着工业化的大踏步前进,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历史的与伦理的、科学的与价值的冲突也日益广泛、日益深刻地展示出来。文明发展中的“文化堕距”、历史的获得与失却的逻辑背反以深沉的悲剧冲突的形式撼荡着人们的心灵。某些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半数以上的人宁愿“从非物质的体验中得到快乐,而不是要求得到更多的商品和劳务。”④这就把一系列新的问题提到了哲学家们的面前:如何调整被那纷纷扰扰的物质重心偏至所打破了的心理平衡?如何将心理的超越性与生存的非超越性统一起来?如何实现人类的整体创造力的全面发展与个体的内在性、独特性、丰富性的高度统一?如此等等,促使那些对社会心理的感受力特别敏锐的哲学家们把主要注意力引向文化哲学的研究。

还应看到,在落后民族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历史的与伦理的冲突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在19世纪的俄国,反映旧的宗法农民心理的斯拉夫派和农奴制改革后所出现的一批“忏悔的贵族”(民粹派),都热烈地钟情于俄国农民所憧憬的“美丽的荒原”的乌托邦主义,希望在俄国保持和发扬村社农民所具有的传统的高尚道德,并借助俄国农业村社的经济组织形式来抵制和防止工业文明浪潮的侵袭。但是,对于俄国民族的生存来说,工业文明的发展又是如此紧迫;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惨败说明,“即使从纯粹军事的观点来说,俄国也是需要工业和铁路的”(恩格斯语)。而工业文明的发展,竟又是如此势不可挡,乃

至于与大工业相适应的西欧的思想和情感方式”，也汹涌澎湃地冲击着俄罗斯的古老土地。19世纪40—60年代俄国西欧派、斯拉夫派、民族精神论派的论战，19世纪80—9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的论争，就是俄国在走向现代化途程中的各种社会心理的冲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在中国，社会心理中的历史与伦理的冲突更为剧烈。清末民初比较普遍流行的社会心理认为，西方的物质文明固然发达，但精神文明却日见凋敝，惟有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是最高尚的；而在中国社会各种职业的人们中，则以农民的道德为最高；我们可以向西方学船坚炮利、声光化电，但精神文明方面却万万学不得，相反，我们的传统道德倒可以医治西方社会的弊病。这种社会心理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中国社会现代工业文明的代表者们却是另外一种心理状态，他们希望用科学的精神、民主的精神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两种对于历史的与伦理的冲突的不同解决方式曾经在思想界多次引起激烈的文化论争，如戊戌维新时期、“五四”时期和30年代等。随着人们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化，人们心灵中的矛盾也更为深刻：现代化固然紧迫，但顾及了文化的时代性是否会导致文化的民族性的丧失？文化选择的历史尺度固然重要，但是否还应顾及文化选择的价值尺度？二者可否统一，又何以统一？这一切，都只能诉诸文化哲学的研究才能解决。

3. 文化哲学的直接来源之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

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为文化哲学成为世界性哲学主潮提供了大量的、经过科学论证的素材和可供提炼升华的思想资料。民族学着重研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的发生、发展及其消亡的规律；人类学一般有两个分支，即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前者着重研究人类的进化问题以

及各个种族之间为什么会有体质上和体态特征上的差异，后者则着重研究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异同以及产生这些异同的原因。社会学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以及这些规律在个人、阶级、社会集团的活动中的作用和表现形式。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起源于17世纪的西欧，是随着新航路的开通和新大陆的发现，西欧人日益广泛地接触到世界各民族不同的风俗民情而产生的，但真正形成学科是在19世纪。这一时期的学者，如巴霍芬、弗赖泽、拉伯克、麦克勒兰、摩尔根和泰勒等，都被认为是民族学家，亦被认为是人类学家。19世纪亦是社会学产生并形成学科的时期，但这一时期的社会学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早期社会学家斯宾塞、涂尔干、李普特与当时的民族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都共同使用民族志的资料和比较方法，他们的理论大部分也是相同的。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严译《群学肄言》）不仅对民族学的内容和定义作出了实在的贡献，而且第一个提出了著名的“文化模式”论。涂尔干专门研究澳大利亚的土著人，注重分析他们的文化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为后来的文化功能学派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三个学科之间的分野是如此不分明，以至于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泰勒，亦被称为“社会学之父”。在以后的发展中，三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与范围逐渐明确，社会学主要研究复杂的现代文明社会，民族学主要研究简单的、没有文字的原始社会，而文化人类学则研究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文化（主要限于狩猎社会、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近年来有些文化人类学家开始把现代工业社会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这些人被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家通过参与观察法和小范围内的实验调查等方法来多方面地搜集资料，以求得对社会文化背景的全面了解；社会学家通过问卷式和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来获得对各个具体社会

问题的大量实证材料，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和总结。所有这些，都为文化哲学家提供了大量经过科学论证的素材和可供进一步提炼升华的思想资料。文化哲学不再停留在哲人的玄虚思索，而以科学考察所取得的实证材料为基础。生物人类学对于人类的匮乏性和遗传基因的研究，神经心理学对于人的大脑的研究，为揭示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殊本质提供了生物学的依据；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对于“活化石”的研究，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为揭示文化的发生、文化的结构、功能和价值以及文化模式的多样性提供了大量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文化哲学结论赖以成立的必要佐证；社会学对于现代社会的研究，为文化哲学探寻人类的精神出路提供了具有导向性的启迪；更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学，提供了关于人类心灵奥秘的大量实证分析，为文化哲学概括人类的精神现象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如果说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还主要是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的话，那么当代世界关于人的科学研究则为文化哲学的建立奠定了实证科学的基础。

(二)

梁启超说：“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蛻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⑤梁氏此说，其实是大可以商榷的，思潮之演进，总是前波推后波，递相衍生，后者扬弃前者，后者包含前者，生生不已，岂有佛家所说“灭”之理？《易》曰：“元亨利贞。”朱子注：“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⑥他更举例说：“梅蕊初生为元，开花为亨，结子为

利，成熟为贞。生为元，长为亨，成而未全为利，成熟为贞。”^⑦元、亨、利、贞或生、长、遂、成是事物生存发展的四个阶段，亦是思潮发生发展的四个阶段。当其果实熟透而至于陨落，则新的思潮又在萌生之中，如贞下元起，迭相演进。但新旧思潮在性质上的差异，自然应当予以特别的注意。文化哲学思潮的演进，目前已经历了其萌生期、生长期，而进于结实期。

1. 文化哲学的萌生期——从维科、赫尔德、康德到叔本华。

西方的文化哲学，通常认为是从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康德主义开始。然而要看出文化哲学历史发展的真面目，却不能不追溯到维科、赫尔德和康德。维科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首先提出了人类世界是由人自己创造的观点，首先明确区分了文化和自然。他指出：“在那为密密层层黑暗所笼罩的远古时期——离我们已太过遥远了——有着一束永恒的、无可怀疑的真理之光；世俗社会的世界必定是人创造的，因此它的原则就应当到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变易中去寻找。”^⑧他对哲学家们竟然不遗余力地研究物质世界而忽视了各民族的文化世界惊诧不已，并且开始肩负起“从人类心灵的变易中”去认识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世界的使命。赫尔德主张，不仅要对人类外在的历史进行考察，而且要对作为人类完美性的精髓的人性的历史进行考察，以寻觅人类的精神归依^⑨。康德进而对“文化”与“文明”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认为人类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技术性、物质性的事物和精神的各种外化形态都属于“文明”，而构成人类本质力量的精神的内在性因素才属于“文化”，文明是外在形式，文化才是内在的深层本质。因此，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的批判》，分别以纯粹的理性、绝对命令的意志、超功利的情感为进程，在范畴中、在自由中、在审美中去追求一个理想的真、善、美的精神世界。正如有的文化哲学研究者所揭示的，他更

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神妙难测的而又引人入胜的“物自体”，把它放置到理想的彼岸世界之中：对纯粹理性来说，她深闭而固拒，令人生“隔花人远天涯近”之感；对实践理性来说，她略启门扉，然而终究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对审美来说，她提示人们有一座桥梁可以通过……。这“物自体”究竟是什么？谢林猜是自我与非我之上的绝对，又说绝对体就是“原始意志”，是在一切之先的生命欲望（连神也不例外）。至于如何实现与“物自体”的合一？谢林认为，知识是神性的理想存在，当精神从事理智活动与创造时，永不能实现绝对体；与此不同，艺术则是神性的理想存在，只有在自然中或在艺术中之美感出现时，才能实现与绝对体的合一。他的思想继承了康德，而又启迪了叔本华以后的文化哲学家。与黑格尔同时的叔本华认为“物自体”是宇宙生命的意志，开启了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先河。

2. 文化哲学的生长期——新康德主义与现代西方文化哲学。

19世纪中叶以后，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和西南学派（即“巴登学派”或“海德堡学派”）如双峰对峙而二水分流。与马堡学派用自然科学的精神阐释康德的学说、把哲学限于知识而弃绝一切形而上学相反，以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韦伯等为代表的西南学派，以人文学科的精神阐扬康德的学说，力图以文化价值的探究来重振形而上学，他们倡导先验观念论的文化哲学，重在对于文化价值的要求。他们反对只走知识逻辑的道路，认为文化哲学是以价值为中心的对真善美的应然价值的追求，是生命、自然、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不可少的学问。在逻辑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三者中，他们最重视的是审美的价值，它使人从欲望与意志在现实世界中的不满足与缺乏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幸福，通过发自天然的灵感而达于最美好的境界。

至于宗教价值，则是体现于真善美三者之中或之间的一种主体超越感，是一种无限的希望，以解决“价值一应然”与“实在一实然”之间的二元对立。19世纪末，狄尔泰发出了为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人文学科争地位的呼声，强调社会生活的主观性和历史性，以及与自然科学方法相区别的人文学科方法的特殊性。尼采创立了他的强力意志的文化哲学，这是西南学派的文化哲学的进一步发展。马堡学派与西南学派的分歧，是西欧文化两种精神的表现：前者是典型的日神精神，而后者更富有酒神精神的气质；前者主要是科学的、理智的，后者则主要是审美的、情感的。但在文化哲学的发展中，马堡学派则比西南学派逊色得多。

20世纪以来，在新康德主义的两派文化哲学学说的激荡和影响下，各种文化哲学学说蜂出并作，有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的文化哲学，有胡塞尔的本质的文化哲学，有舍勒尔的情感的文化哲学，有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的文化哲学，有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历史的文化哲学，有杜威的社会的文化哲学，有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的文化哲学，有弗洛姆的生理心理主义的文化哲学，有罗素的知识的文化哲学，有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的文化哲学，有卡尔纳普的逻辑主义的文化哲学，有德日进的整体演化的文化哲学，有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的文化哲学，有宋巴特的人学的文化哲学，有史怀哲的人道主义的文化哲学，有索罗金的类型的文化哲学，有斯普兰格的心灵型的文化哲学，有怀特海的机体文化哲学，还有卡西尔的人类符号的文化哲学，其中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的文化哲学，是比较明显地继承了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的传统；而柏格森、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斯普兰格等人的文化哲学，则比较明显地继承了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派传统互相靠拢乃至走

向统一和融合的趋势。罗素在1919年还嘲讽柏格森的文化哲学是“骗巴黎时髦妇人的”，可是曾几何时，他也研究起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相互关联来了。马堡学派文化哲学的最后重镇——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也已或多或少地受到非理性主义文化哲学的浸染。“拒斥形而上学”的呼声，在本世纪50年代后逐渐消逝，同时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文化哲学流派也开始用逻辑分析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杜威、胡塞尔的文化哲学兼有两派传统的特征；索罗金的文化哲学从文化的整体性出发来说明人的自我创造性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的统一，而梅罗-庞蒂作为法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更进一步提倡胡塞尔对两派传统“一视同仁”的思想，主张“在世界的或合理性的观念中联合极端主观主义与极端客观主义”。在他以后兴起的结构主义的文化哲学把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和文化人类学作为自己的理论来源，力图把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统一起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把历史看作是人的本能冲动（“快乐原则”）与科学理性、社会文明（“现实原则”）的冲突史，试图在历史文化的发展中将二者统一起来。更有舍勒、普列斯纳、兰德曼的文化哲学，其方法更明显地体现为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的结合和将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融为一体的趋向。

文化哲学业已经历了萌生期和生长期，进入了第三期的发展。第三期是结实期，是形成文化哲学体系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到来的时候，有必要对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树及其有待克服的局限性进行系统的考察。